

【区域开放与合作】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朱念 谷玉 庞子冰

**摘要:**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东道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笔者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投资便利化程度低、中、高三类,选取2010—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数据及2020年营商环境数据,研究“一带一路”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与中国投资活动的引力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时间效应来看,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无显著变化;不同投资开放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开放度

**中图分类号:**F803.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6-0140-08 **收稿日期:**2022-07-15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19XJY015);2020年北部湾海洋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枢纽经济视域下广西北部湾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门户港研究”(BH2KY202004);2021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广西城市交通新业态的社会影响与治理研究”(21FSH022);2022年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中国(广西)自由贸易区支持政策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企业投资意向的影响研究”(WLBKT2022-01)。

**作者简介:**朱念,男,北部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钦州 535011)。

谷玉,女,北部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钦州 535011)。

庞子冰,女,北部湾大学钦州发展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通信作者(钦州 535011)。

## 一、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截至2021年年底,通过签署合作文件的形式,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及32个国家组织已确认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双边的贸易与投资合作,经贸合作文件数量达206份,“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峰会强调了投资、贸易便利化合作的重要意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成为各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进程中共同聚焦的问题。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但由于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参差不齐、疫情之下对外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企业投资转型面临更大挑战等因素,对外投资活动仍面临不少约束。已有研究多从单一样本角度讨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投资活动的影响,一方面忽略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及实施时间对样本的影响因素,造成分析结果没有与政策内容及社会背景有机融合;

另一方面忽略了投资开放度不同的国家间具有不同的特性。因此,本文通过构建不同时间段、不同投资开放度下的多样本的扩展引力模型,分类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分析在哪些方面显著影响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投资活动,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测度与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包括各个国家的投资环境、相关法律制度、投资办事流程等内容。为使问题的研究更具针对性与有效性,本文通过选取指标对各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量化分析,并对东道国进行分组处理。

### 1. 投资便利化指标的选取

通过文献研究,我们发现不同文章中对于投资便利化指标的选取不尽相同,但多数文章都提及营商环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指标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且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王宇,2021)。营商环境指标在评估过程中包含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包括经济条件、市场

环境、金融社会稳定、对外贸易往来、货币交换自由、政府服务和法律体系等,并结合社会发展进行更加多元化的探索(刘叶芬,2021)。因此,本文选取营商环境指标作为量化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指标。

依据世界银行对2010—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评分标准,分值范围为1—100分,越接近100分,说明评分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投资便利化水平越高。因数据缺失等原因,剔除不丹、马尔代夫、马其顿、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6个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58个国家展开分析。本文计算了2010—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营商环境指标评分的平均得分,依照平均得分分布情况,将58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分为三类:低投资便利化国家(营商环境便利度评分<60)、中等投资便利化国家(60≤营商环境便利度评分<70)、高投资便利化国家(营商环境便利度评分≥70)。依照数据的计算及归纳结果,投资便利化国家的分类如表1所示。从表中数据分析得出,多数国家的投资便利化处于中等水平(25个),《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也归纳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平均得分为71.4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8分,但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高收入国家平均得分(78.62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营商环境便利度评分分组情况

低投资便利化国家 (营商环境便利度评分<60)	中等投资便利化国家 (60≤营商环境便利度评分<70)	高投资便利化国家 (营商环境便利度评分≥70)
尼泊尔、斯里兰卡、菲律宾、黎巴嫩、埃及、约旦、伊朗、乌克兰、印度、柬埔寨、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门、叙利亚、老挝、伊拉克、孟加拉国、缅甸	匈牙利、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土耳其、阿曼、黑山、巴林、卡塔尔、克罗地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沙特阿拉伯、阿塞拜疆、希腊、白俄罗斯、蒙古国、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越南、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文莱、波黑	新加坡、格鲁吉亚、爱沙尼亚、马来西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阿联酋、泰国、以色列、波兰、捷克、俄罗斯、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公开数据网站 World Bank Open Data。

### 2. 模型设定及实证研究

引力模型是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经典分析方法,本文综合学界对引力模型的发展演变,构建投资扩展引力模型,结合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与混合 OLS 等对所建模型进行估计与解释。本文主要研究解释变量投资便利化对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根据以往文献及资料将解释变量  $Ease$  (投资便利化水平) 加入原始的引力模型公式形成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同时在每次回归中依次加入控制变量  $CPOP$  (中国人口)、 $FPOP$  (其他国家人口)、 $Trade$  (东道国的贸易开放程度) 以

及虚拟变量  $Border$  (国家是否与中国接壤) 等。其中,不与中国接壤时  $Border$  取值为0;反之, $Border$  取值为1。将引力模型两侧同时取自然对数模型后最终公式为:

$$\ln(OFDI_{it}) = \alpha_1 \cdot \ln(CGDP_t) + \alpha_2 \cdot \ln(FGDP_{it}) + \alpha_3 \cdot \ln(DIS_t) + \alpha_4 \cdot \ln(CPOP_t) + \alpha_5 \cdot \ln(FPOP_{it}) + \alpha_6 \cdot Trade_{it} + \alpha_7 \cdot Ease_{it} + \alpha_8 \cdot Border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alpha_i (i=1, 2, \dots, 8)$  为系数, $\varepsilon_{it}$  为常数,变量名称、解释及预期符号如表2所示。

### 3.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剔除

表2 变量名称、含义、预期符号及理论解释

变量	含义	预期符号	理论说明
$CGDP_t$	中国在 $t$ 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百万美元)	+	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及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经济总量越大,潜在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越高。
$FGDP_{it}$	其他国家在 $t$ 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百万美元)	+	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经济总量越大,潜在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越高。
$DIS_i$	国家 $i$ 首都与中国首都北京之间的绝对距离(千米)		代表运输成本高低,认为是贸易的阻力,阻力越大,出口额越小,倾向于实行对外直接投资。
$CPOP_t$	中国在 $t$ 年的人口总量(千人)	+/-	人口越多说明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对于商品潜在需求量越多,更需要其他国家投资设厂带动经济,或者不需要依赖外商直接投资。
$FPOP_{it}$	其他国家在 $t$ 年的人口总量(千人)	+/-	人口越多说明市场规模越大,市场对于商品潜在需求量越多,更需要其他国家投资带动经济,或者不需要依赖外商直接投资。
$Trade_{it}$	其他国家 $i$ 在 $t$ 年的贸易开放度	+	贸易开放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对该国实行对外直接投资。
$Ease_{it}$	国家 $i$ 在 $t$ 年的营商环境便利度评分	+	营商环境便利度评分越高,该国投资便利化水平越高,更加有利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Border_i$	国家 $i$ 是否与中国接壤	+/-	两国接壤表示两国熟悉程度高、不确定性小,有利于到该国投资;或者可能接壤的两国之间风俗习惯等较为相近,文化距离小,对该国对外直接投资难度较小,人们的意愿高。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不丹、马尔代夫、马其顿、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6个国家),因变量和自变量均使用年度数据,研究的时间范围为2010—2018年。用于测度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标评分均来自世界银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及计算这些国家的投资开放度所用到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均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和EPS数据平台。贸易开放度计算所用到的进出口数据来源于国际贸易中心编写的Trade Map-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之间的距离用EPS数据平台、Travelmath trip calculator网站中的飞行距离代替直线距离,各东道国及中国的人口数来自数据库EPS数据平台。

#### 4. 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使用stata15软件,实证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表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7)的回归估计结果均表明,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能够较为显著正向地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模型(1)基于最初的标准引力模型加入解释变量投资便利化水平指标营商环境( $Ease$ )的回归;模型(2)进一步控制了人口因素带来的影响;模型(3)

进一步控制了贸易开放程度( $Trade$ )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模型(4)加入了虚拟变量即东道国在地理位置上是否与中国接壤( $Border$ ),分析与中国接壤这一变量是否会影响中国的投资活动;模型(5)为计量方法中的固定时间效应,模型拟合程度好;模型(6)为输入国家固定效应模型指令后的结果;模型(7)为本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投资活动的输出结果。但在模型(5)—(7)中因部分变量只在时间维度上有变化,所以没有输出结果,本文着重解释模型(1)—(4)。

在本文加入的各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经济规模( $FGDP$ )和贸易开放程度( $Trade$ )对中国提升在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而中国首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 $DIS$ )输出结果为负值,认为该控制变量显著减少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规模( $CGDP$ )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投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国人口数( $CPOP$ )与是否接壤( $Border$ )的回归系数符号符合预期,但不显著。模型回归结果与以往文献具有一致性。

进一步对比分析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标的变化发现,大多数国家的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标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表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回归结果

自变量	(1)	(2)	(3)	(4)	(5)	(6)	(7)
<i>Ease</i>	0.0342** (0.0158)	0.0366** (0.0180)	0.0341** (0.0178)	0.0345** (0.0179)	0.0672*** (0.0174)	0.0413** (0.0183)	0.0413** (0.0183)
<i>lnCGDP</i>	2.3031*** (0.4016)	6.5539 (5.4108)	4.8040 (5.4839)	4.8064 (5.4847)	—	3.4317 (5.5161)	2.1627*** (0.4097)
<i>lnFGDP</i>	0.5615*** (0.1670)	0.5041* (0.2749)	0.5575** (0.2693)	0.5562** (0.2736)	0.6285** (0.2743)	0.2131 (0.2787)	0.2129 (0.2786)
<i>lnDIS</i>	-3.7422*** (0.6232)	-3.6510*** (0.7087)	-3.0314*** (0.7564)	-3.0088*** (0.8418)	-2.6461*** (0.8385)	—	—
<i>lnCPOP</i>	—	-59.858 (75.833)	-36.442 (76.768)	-36.511 (76.783)	—	-17.819 (77.227)	—
<i>lnFPOP</i>	—	0.0703 (0.2739)	0.0964 (0.2679)	0.0988 (0.2702)	0.2176 (0.2699)	0.6000** (0.2587)	0.6012** (0.2587)
<i>Trade</i>	—	—	24107.2** (12109)	23951.24** (12157)	31972.1*** (12247)	41347*** (11554)	41683*** (11420)
<i>Border</i>	—	—	—	0.0514 (0.7270)	0.4279 (0.7214)	—	—
<i>R</i> <sup>2</sup>	0.4210	0.4211	0.4508	0.4511	0.4218	0.3444	0.3446
<i>Wald</i>	114.14	114.09	120.86	119.78	87.39	97.00	97.14
<i>N</i>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365

注:1.模型的因变量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括号中的数值为模型输出的标准差。因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检验,因此输出Wald检验值,并考虑实际选择模型输出的整体R<sup>2</sup>。\*、\*\*和\*\*\*分别表示在10%、5%、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2.模型(5)—(7)中的CGDP只在时间维度变化,但刚好不能被时间固定效应表现出来,因此不能被识别,CPOP同理;模型(6)中的控制变量DIS与虚拟变量Border不能被国家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模型(7)同理。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有所增加,对于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本文对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投资活动的影响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存在疑问,因此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时间点作为分隔点,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两个样本分别回归进行对比分析。将2010—2013年的样本数据与2014—2018年的样本数据做回归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两个时间样本中东道国对中国OFDI的影响均较为显著且呈正相关。不同时间段的营商环境指标系数数值相近,仅有细微的变化。营商环境系数数值略小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及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分析可能的原因:一是从政策本身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依旧在不断完善和推进落实中,相关数据还在不断更新;二是从国际形势来看,部分东南亚以及中东欧地区政治局势依旧较为复杂且动荡不安,外加部分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阻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投资便利化进程;三是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各个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导致对外经济合作进程不进反退。

投资及贸易开放度指标数据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及对外贸易依存度。构建投资开放度能够进一步探究不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国家之间投资便利化水平是否显著影响投资活动,并观察对比不同投资开放度水平下的东道国,其便利化水平对中国投资选择影响的差异。世界银行对该指标的公式定义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sub>i</sub>*)与外商直接投资(*FDI<sub>i</sub>*)的和占名义生产总值(*GDP<sub>i</sub>*)的比重,具体公式为:

$$Open_i = \frac{(OFDI_i + FDI_i)}{GDP_i} \quad (2)$$

本文计算出每个国家在2010—2018年的投资开放度平均值。按照投资开放度数值分布依次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三组样本,分别为:投资开放度<

表4 2010—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引力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时间样本 自变量	2010—2013年				2014—2018年			
	(1)	(2)	(3)	(4)	(1)	(2)	(3)	(4)
<i>Ease</i>	0.0150* (0.0188)	0.0182* (0.0224)	0.0059* (0.0221)	0.0141* (0.0232)	0.0239** (0.0130)	0.0074* (0.0172)	0.0031* (0.0167)	0.0049* (0.0170)
<i>lnCGDP</i>	3.4645** (1.8181)	-6.5808* (32.865)	-13.089* (32.054)	-11.837* (32.037)	1.0708* (1.4055)	65.693* (49.849)	55.901* (48.427)	57.069* (48.524)
<i>lnFGDP</i>	0.6444*** (0.1332)	0.6019*** (0.2077)	0.7399*** (0.2070)	0.7486*** (0.2069)	0.5790*** (0.0930)	0.7938*** (0.1770)	0.8960*** (0.1740)	0.8994*** (0.1743)
<i>lnDIS</i>	-4.1011*** (0.4108)	-4.0413*** (0.4679)	-3.0033*** (0.5649)	-2.7026*** (0.6210)	-3.0467*** (0.3559)	-3.3232*** (0.4023)	-2.4784*** (0.4538)	-2.3103*** (0.5172)
<i>lnCPOP</i>	—	165.13 (541.16)	263.79 (527.64)	241.13 (527.41)	—	-821.94 (634.77)	-693.51 (616.72)	-708.92 (617.99)
<i>lnFPOP</i>	—	0.0572 (0.2087)	0.0798 (0.2033)	0.1560 (0.2134)	—	-0.2609 (0.1794)	-0.2375 (0.1741)	-0.2267 (0.1751)
<i>Trade</i>	—	—	38736*** (12475)	36518*** (12607)	—	—	35551*** (9742.2)	36562*** (9868.0)
<i>Border</i>	—	—	—	0.7324 (0.6316)	—	—	—	0.2725 (0.4004)
<i>R<sup>2</sup></i>	0.4197	0.4204	0.4545	0.4593	0.3953	0.4063	0.4442	0.4455
<i>F</i>	28.39	18.74	18.33	16.24	32.36	22.35	22.26	19.49
<i>N</i>	162	162	162	162	203	203	203	203

注：两个模型的因变量分别是2010—2013年和2014—2018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括号中的数值为模型输出的标准差。因可获得数据年限有限等原因，两个不同时间点的样本均选择混合OLS输出F检验值与R<sup>2</sup>，R<sup>2</sup>为组内R<sup>2</sup>。\*、\*\*和\*\*\*表示两个时间样本模型系数在10%、5%、1%置信水平上通过检验。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0.4的低投资开放度国家、0.4≤投资开放度<1的中等投资开放度国家、投资开放度≥1的高投资开放度国家。本文将分组结果归纳至表5，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32个中等投资开放度国家，其在所有分组中占比最大；高投资开放度国家共9个。对三个样本依次进行回归，模型输出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在低投资开放度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都与北京的直线距离、是否与中国接壤的虚拟变量*Border*在模型(4)中系数为零，其原因是在低投

资开放度国家中只有印度、巴基斯坦与中国接壤，其他国家的首都与北京的距离除孟加拉国、菲律宾外，其飞行距离均集中在5000—7700千米，因该控制变量的变化幅度较小而在软件运行中被忽略，因此系数为0。但模型中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营商环境指标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正数，说明各国政府通过采取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对于促进中国对低投资开放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效果；在中等投资开放度国家中，投资便利化指标在模型(1)、

表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投资开放度数值分组情况

低投资开放度国家 (投资开放度<0.4)	中等投资开放度国家 (0.4≤投资开放度<1)	高投资开放度国家 (投资开放度≥1)
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白俄罗斯、埃及、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叙利亚、土耳其、也门	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波黑、老挝、卡塔尔、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摩尔多瓦、阿联酋、文莱、阿塞拜疆、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吉尔吉斯斯坦、泰国、以色列、越南、捷克、乌兹别克斯坦、马来西亚、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匈牙利、保加利亚、柬埔寨、约旦、格鲁吉亚	新加坡、巴林、黑山、塞浦路斯、爱沙尼亚、黎巴嫩、蒙古国、缅甸、尼泊尔

数据来源：各国GDP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DRCENT Statistical Database System。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EPS数据平台。

表6 投资开放度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

样本 变量	低投资开放度国家				中等投资开放度国家				高投资开放度国家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i>Ease</i>	0.0960*** (0.0282)	0.0947*** (0.0314)	0.0954*** (0.0318)	0.0954*** (0.0318)	0.0154* (0.0173)	0.0021* (0.0182)	-0.0038 (0.0182)	0.0004 (0.0198)	0.0572** (0.0251)	0.0182** (0.0368)	0.0452** (0.0364)	0.0271** (0.0302)
<i>lnCGDP</i>	2.1002*** (0.6715)	-1.0777* (8.7976)	-0.4696* (9.5395)	-0.4696 (9.5395)	2.8212*** (0.7432)	12.306* (10.664)	10.127 (10.604)	10.313 (10.627)	3.1381** (1.6242)	13.408 (24.890)	2.2132 (23.837)	5.5540 (19.653)
<i>lnFGDP</i>	-2.1990** (1.0824)	-2.1392** (1.1860)	-2.1202** (1.1982)	-2.1202* (1.1982)	0.3337*** (0.1080)	0.6168*** (0.1645)	0.7406*** (0.1719)	0.7052*** (0.1834)	1.3612*** (0.2699)	1.7546*** (0.3838)	1.3291*** (0.4004)	2.9085*** (0.4935)
<i>lnDIS</i>	0 —	0 —	0 —	0 —	-4.7176*** (0.3719)	-5.4548*** (0.4887)	-4.8529*** (0.5522)	-4.6321*** (0.6788)	-3.1539*** (0.5332)	-3.4921*** (0.5796)	-1.8710** (0.8567)	0.0459 (0.8346)
<i>lnCPOP</i>	— —	46.575 (122.30)	38.127 (132.60)	38.127 (132.60)	— —	-131.89 (149.59)	-100.31* (148.80)	-103.57 (149.16)	— —	-142.90 (345.83)	19.277 (331.72)	-56.131 (273.84)
<i>lnFPOP</i>	— —	-0.6084 (2.4404)	-0.5984 (2.4557)	-0.5984 (2.4556)	— —	-0.4517** (0.1972)	-0.5001** (0.1965)	-0.4219* (0.2411)	— —	-0.5394 (0.3515)	0.1957 (0.4461)	-1.1060** (0.4760)
<i>Trade</i>	— —	— —	-9179.9 (53747)	-9179.9 (53747)	— —	— —	20721** (9153.4)	19993** (9259.7)	— —	— —	57116** (23297)	59779*** (19202)
<i>Border</i>	— —	— —	— —	0 —	— —	— —	— —	0.2805 (0.4998)	— —	— —	— —	5.8239*** (1.3534)
<i>R<sup>2</sup></i>	0.1933	0.1956	0.1959	0.1959	0.5067	0.5205	0.5320	0.5328	0.6245	0.6485	0.6977	0.8004
<i>F</i>	6.71	3.99	3.29	3.29	54.19	37.81	33.78	29.50	16.63	11.69	12.20	18.04
<i>N</i>	104	104	104	104	216	216	216	216	45	45	45	45

注:模型的因变量分别是中国对低、中、高投资开放度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括号中的数值为模型输出的标准差,低投资开放度国家与高投资开放度国家鉴于样本量较少采用混合 OLS,中等投资开放度国家采用固定效应回归。 $R^2$ 均为输出的组内  $R^2$ ,并归纳各模型对应输出的  $F$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5%、1%置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2)中系数为正,且较为显著,但在模型(3)、(4)中系数出现负值且不显著,基本可以认为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于中国对中等投资开放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效果不明显;在高投资开放度国家中,投资便利化指标模型(1)—(4)中系数为正,较为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GDP、其首都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各国贸易开放度、是否与中国接壤等指标均较为显著,基本可以说明这些指标的提升对于中国对高投资开放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 三、研究结论

在对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量化的过程中,采用营商环境指标评分,实证探究被解释变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指标体系间的影响效应关

系。首先,本文按照营商环境指标分布的不同区间分成三组,分别是:低、中、高投资便利化国家,能够观察得出多数的“一带一路”国家包括中国均处于中等投资便利化水平。其次,使用修正扩展后的投资引力模型,利用混合 OLS、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固定时间效应模型、固定个体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模型系数,分析各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并在各样本中较为显著。同时,在对不同时间样本的对比分析中得出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依然对中国对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再次,引入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之和占 GDP 的比重作为投资开放度指标,将样本分为低、中、高投资开放度国家三组,对每个样本构建投资引力模型。结果表明,对中等投资开放度国家而言,投资便利化水平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中国对其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变化,而对低、高投资开放度国家而言,投资便利化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作用显著。

通过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能够较为显著地促进中国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是各国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加大投资合作力度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不同时间段的样本中,营商环境指标的系数相近,但无明显改变,可能的原因是“一带一路”政策仍在不断完善的进程中,部分地区的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呈现暂缓趋势,各国之间的经济规模及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积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建设,并通过双边关系带动经济发展,缩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强各区域的互联互通水平及“一带一路”沿线关键节点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三,对不同投资开放度国家而言,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与其进一步加深投资合作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对不同投资开放度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应侧重不同方面。例如,对低、高投资开放度国家应当将营商环境的建设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而对中等投资开放度国家而言,在营商环境建设的基础上,还应注重国家间进行投资合作时承担风险的能力及风险敏感度的提升。

#### 四、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对策建议

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以促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地获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未来双边应全力推进投资便利化谈判进程,加强便利化水平建设,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弘扬合作发展的理念及优势,广泛参与投资便利化建设的谈判,加大投资便利化建设投入。通过磋商谈判,构建合理的、较为统一的边境管理制度,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制度,接轨国际标准和要求。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带动沿线国家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及线上平台建设。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加大经贸与投资合作,提升项目门槛,深化改革理念,促进企业投资转型。从商业模式、管理模式、资本模式等角度出发,坚持新发展理念,提升深化合作的标准,例如,全面降低投资企业碳排放,使其能够符合“碳达峰、碳中和”的最新标准等。在资本及商业模式方面,构建线上展厅,实行网上推介,为“一带一路”成员经济体搭建新技术、新产业、新发展的交流、合作、交易平台。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共建“两国双园”。充分利用现有的自贸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两国双园”示范点,以点带面逐步扩大到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更大范围,在遵循互信、互利、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广泛开展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政治互信及互联互通建设,促进形成“一带一路”的区域大合作。

第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加强制度建设,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综合竞争力。营商环境包括政府对企业的审批制度效率,依法依规执法的要求,良好的政务环境等,因此需要各政府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同时需要政企之间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及时了解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存在的问题,简政放权,为企业打造“一次办好”的利国惠民的营商环境。构建企业评级机制,对评分较高的企业可以减少甚至取消不必要且冗杂的审批项目,提升服务和管理效率等。

第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提升营商环境的法治化水平,着力解决中小企业审批烦琐等难题。在制定具体法律、法规及监管程序时突出“新”字,重点保障新的监管理念渗透到法规和条例中,保障投资体制转变能够有法可依,引领实现企业更进一步的投资及贸易自由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细化实施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条例,适当放宽税收政策及外汇政策使企业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

第六,不同的“一带一路”投资开放度国家投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中等投资开放度国家承担风险的能力及风险敏感度均处在中等水平,除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外,还应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多措并举提升自己在投资谈判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表明立场与观点积极争取更多的国际投资及双边贸易的机会。相较而言,低、高投资开放度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是决定其获得对外直接投资额多少的关

键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政务建设、政策制定、城市资源等方面入手,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从而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而促进全球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持续提升。

### 参考文献

- [1]王东京.国际投资引力论[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9(5).
- [2]蒋殿春,张庆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J].世界经济,2011,34(5).
- [3]周杰琦,夏南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对外投资广度、深度及绩效的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21(11).
- [4]杭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21.
- [5]付秀梅,陈睿姝.“双循环”背景下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中药出口贸易影响[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6]王宇,韩璐,李影,等.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分布选择[J].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2(2).
- [7]刘叶芬.我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21.
- [8]华若虚.全面开放格局下银行业竞争和效率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8.
- [9]陈怀超,田晓煜,张月婷.制度落差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对称效应: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1(8).
- [10]Kennerley M, Neely A. Measuring Performance in A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2003, 23(2).
- [11]刘永辉,赵晓晖.中东欧投资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1).
- [12]陈升,过勇.东道国营商环境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3).
- [13]王雪,马野驰.东道国金融发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37(8).
- [14]张海伟,郑林雨,陈胜发.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22,36(1).
- [15]郝兴.RECP对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J].中国储运,2022(3).
- [16]崔日明,黄英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9).
- [17]何馨悦,刘佳琪,刘禹杉.双边关系、制度距离与辽宁企业OFDI区位选择:基于负二项—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现代商业,2022(10).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Level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on China's OFDI

Zhu Nian Gu Yu Pang Zibing

**Abstract:**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lev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low, medium and high degree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The data of 58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10 to 2018 and the data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2020 are selected to study the gravit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level of the host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investment activ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level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has promoted China's OFD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effect,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level h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on investment activities.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level on China's OFDI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ith different investment openness is heterogeneous.

**Key Words:**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Leve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vestment Openness

(责任编辑:张子)